



中国交响乐团成立70年了。一系列团庆音乐会中,9位指挥家接续执棒的“庆祝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建团70周年交响音乐会”尤为引人瞩目。

中国已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音乐市场之一。在用音乐语言讲好中国故事方面,交响乐承担新的历史使命。中国交响乐魅力何在,如何创作出有时代标志性的交响乐作品?我们听听老中青三位指挥的心声。

老一辈为我们筑牢了根基

记者:交响乐在中国落地生根,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蜕变。老一辈艺术家为中国交响乐奠定了怎样的精神底色与艺术追求?

陈燮阳:老一辈艺术家为中国交响乐筑牢根基:搭建专业音乐教育体系,艰苦筹建本土交响乐团,建立规整的乐团运营模式……他们用踏实纯粹的艺术初心,拥抱磅礴热烈的时代,让中国交响乐拥有了民族的内核。

李心草:恩师严良堃先生常说,“音乐要有温度,不能只有技巧”。他排练《黄河》,一字一句打磨合唱与乐队的情绪,哪怕只有一句悲愤旋律,也会排练数十遍。在创作上,他们扎根人民;在治学上,他们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在传承与创新上,他们筚路蓝缕,担当艺术摆渡人。在与老一辈指挥家学习相处的过程中,我理解何为“艺高者德重”。

景焕:与指挥家前辈一同执棒“庆祝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建团70周年交响音乐会”,我倍感荣幸。令我格外自豪的是本次演出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采用了中文译配版。这个版本是我的外婆邓易当年在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前身)任职期间译配的,是前辈的肩膀托举了今天的我们。

记者:《黄河》《梁祝》《红旗颂》等作品沉淀为中国人共同的交响记忆。这些经典作品的魅力怎么看?

李心草:这些经典之作既有专业交响的严谨架构,又有独属于中国的思想内核和审美表达。经典的魅力,源于一代代艺术家赋予新的诠释、挖掘新的内涵。



深情致敬基层官兵

当 I 我深入合成营改革的肌理,看到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军人在转型中蜕变、冲锋,我想做的,就是把这份真实搬上荧屏。《兵自风中来》(见上图,片方供图)选择电视剧《突出重围》式正面强攻,以合成营改革、陆军转型为核心,直面强军阵痛。这类题材尺度敏感、拍摄极难,我的思路是:不做悬浮爽剧,不堆砌装备,把镜头对准改革浪潮里有血有肉的基层军人。

开篇红蓝对抗是重头戏。为了让观众感受到“演习即打仗”,我们设计了中弹冲击特效,红蓝烟标识战损……用视听还原残酷。拍摄前我反复强调:别当表演,全按真实的标准来。

剧中所有装甲车、雷达、通信设备均为1:1定制。群演为退伍军人,自带队列习惯和战术神态,让军质质感落地。我坚持装备服务人物,战场的核心是人。只在战局胶着、需要破局时展现新装备如何改变思路,所有高科技桥段紧扣战术选择,让观众看懂指挥员的思路,而非单纯炫技。剧中“价值魔方”是抽象概念,我们善用特效可视化,将理念贯穿多场演习,通过兵种重心切换具象表达,远火攻坚时所有力量围绕火力调配,特战渗透则以特战班组联动。跟随对抗,观众自然读懂这套灵活战法。

人物塑造上,每位主演都有细化要求。饰演“铁血营长”郭子剑的欧豪刻意晒黑、保持棱角开裂,调整语速发声,反复走队列站姿,用军营集体氛围磨去少年感。几场训兵、直面矛盾的戏下来,郭子剑的兵味立住了。蓝盈莹饰演梁虹,我们用大量专业对战戏凸显职业女军人的核心作用。观众对刘奕君塑造的副军长梁北华好评最多。有场戏是郭子剑演习失利,梁北华复盘,一句“他爱他的兵,却也害了他的兵”,刘奕君眼眶泛红、眼泪打转,瞬间释放出对改革受挫、对年轻军官失望又痛心的复杂情绪。这段即兴,我完整保留,演员沉稳外表下的爆发力,让角色跳出传统模板。徐洪浩饰演的索建安,是全剧最有层次的悲情人物。前期反感他的人最终为他落泪,因为我们完整呈现了老兵在变革中的选择与牺牲。

创新不靠爆炸、装备、场面,落脚点当永远是人。我们挖掘典型人物与演训事件,赋予角色烟火气,把强军情怀融入日常。我们也不造完美英雄,敢于展现军官改革路上的迷茫、老兵转型的痛苦、基层练兵的艰难,让军营既有炮火硝烟,也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

在我看来,军旅作品展示战争的残酷、练兵的艰辛,应当传递以强大军队守护长久和平的愿望。能拍摄一部深情致敬新时代基层官兵的作品,完成埋藏心底的军旅梦,是我的荣幸。

(作者为电视剧《兵自风中来》导演)

要有根，要拥有民族精神

——指挥家眼中的中国交响乐

对话人:陈燮阳(上海交响乐团名誉音乐总监)
李心草(中国音乐学院院长)
景焕(中国交响乐团常任指挥)
王璠 赵偲汝(本报记者)

景焕:无论是战火中诞生的《黄河》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的《梁祝》《红旗颂》,这些经典都是从时代和民族的土壤里长出来的,不刻意炫技、不生硬堆砌,以真情为底色。

陈燮阳:与其说是美好的音乐久久不散,不如说是炽热的家国情从未减退。这些作品唤起我们流淌于血液中最深厚的民族情结。我们必须重视中国表达。比如《梁祝》,完整学习西方交响乐技法,大量吸收中国戏曲、民歌的音调旋律,加入板鼓等民族乐器,所有技术服务于表达中国故事、中国情感。

经典也是演出来的。优秀作品不该被束之高阁,必须接地气、反复演、持续打磨,让观众真正欣赏、亲近中国交响乐。

要创作出具有时代标志性的交响乐作品

记者:今天的中国,有丰富多彩的音乐会、众多的交响乐团、繁荣的音乐教育市场……当下最让你们感慨的变化是什么?中国交响乐目前的状况是怎样的?

陈燮阳:如今,很多城市不只有一家音乐厅或剧院,观众有可以欣赏交响乐的地方,乐队也有演出的场地。这很重要。过去,海外观众不了解中国交响乐,甚至会发出疑问,中国有交响乐吗?如今,世界优秀的交响乐团都期待来中国演出,听中国的声音,和我们交流。

每一代人都应该有属于自己时代的标志性交响乐作品。目前来看,能广泛巡演、大众耳熟能详的交响乐作品仍然稀缺。我们还是聚焦创作,努力建立孵化、复排、传播中国交响乐作品的长效机制,努力培养青年音乐人扎根民间、深耕民族音乐的定力。如此才可能创

创作谈

歌剧《伤逝》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初。其改编自鲁迅先生同名小说,由王泉、韩伟编剧,施光南作曲,被誉为“中国第一部抒情歌剧”。作为首演单位的中国歌剧院舞剧院,在45年后,将这部经典之作再次搬上舞台。

经典复排、重排,是形成和保持一个剧院艺术风格的重要方式,也是让经典作品焕发生命力的活态传承。我们在一次次复排、演出剧院经典歌剧《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原野》中,学习了、成长了,对中国歌剧更加痴爱了。

歌剧《伤逝》(见右图,中国歌剧院舞剧院供图)排练的几个月,经典旋律每天回荡在排练场和楼道里。它们曾回响在工厂和乡村的大喇叭里,在无数家庭的小小收音机里。也许很多听众并没有看过全剧,但《一抹夕阳》《紫藤花》《金色的秋光》等旋律却深深刻进了一代人的记忆。

这一次,剧院的朱亚林导演对全剧的戏剧节奏进行梳理,让情节的推进更加简洁紧凑,情感表达更加集中饱满。舞台呈现上,从中国传统戏曲“一桌两椅”的极简写意美学中汲取灵感,通过简约的置景和灯光,搭建出一个充满诗意的多层次舞台空间,用朴素的舞台语言烘托人物心境。导演还将合唱从乐池引入舞台,借鉴古希

2025年12月6日,电影《得闲谨制》上映。从初剪的2小时40多分钟,到公映版本,我们删去了近50分钟。

电影是一场仪式。观众走进影院,便把一段完整的时间交付给创作者。我们可以铺排情节、藏下细节、调动各种视听手段,在某个时刻精准地击中他。但电影终究时长有限,取舍不可避免。

舍弃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多内容从剧本阶段就开始反复打磨,到了现场,又由整个剧组一点点拍出来。每一个人物、每一场戏、每一个画面,都凝聚了很多人的心力。那些被压缩的部分并不是简单的删减,而是我们围绕角色建立起来的生活和经历。

影片上映后,很多观众说想看到那些因为篇幅原因无法出现在大银幕上的内容。没想到,这个想法最终以三集故事片的方式实现了,也就是今天的《莫得闲》。

《得闲谨制》和《莫得闲》不是简单的“短改长”或“番外篇”。它们来自同一个故事、同一次拍摄,有相同的角色,也承载相同的情感。

本版邮箱:ysbjs@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任姗姗 版式设计:赵偲汝

本版邮箱:ysbjs@peopledaily.cn

作出有温度、留得下的中国交响乐。

李心草:中国交响乐原创作品的变化显著:创作者队伍年轻化,创作题材更多元,编曲技法更成熟,民族乐器与交响乐队融合也更自然。我心中优秀中国交响乐的标准:要有根,要拥有民族精神,根植中华文脉和现实生活,技法成熟完整,经得起舞台检验,经得起时间考验。

记者: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成为古典音乐“发烧友”。交响乐也开始破圈,和王者荣耀等游戏跨界合作。怎样让交响乐走进更多人的生活?

李心草:交响乐跨界破圈,吸引年轻人是好事。用人们熟悉的载体展示经典片段,可以拓宽传播渠道,但不能丢掉艺术本体,完整交响乐作品、严谨艺术演绎必须守住艺术底线。未来要做好交响乐的分层普及,兼顾通俗传播与专业深耕,让年轻人先听懂再深爱。

景焕:交响乐普及,不能坐等观众,要主动走近。90多岁高龄的曹鹏老师、郑小瑛老师,仍在一线传播交响乐。他们是我们的榜样。

和广州青年交响乐团(以下简称“广青交”)合作十几年,我见证了古典音乐与年轻人发生的化学反应。对广青交的孩子们来说,交响乐是一起创造、共同分享的快乐,是探索未知和自我的通道。我希望他们对艺术的认知不止于音符,而是能触碰到文学、舞蹈等不同艺术形式交织的完整世界。广青交搭建的三级梯队体系,从6岁开始启蒙,免费提供专业训练,让音乐成为他们一生的爱好和陪伴。

讲述中国人的情感和故事

记者:怎样让作品从内而外散发中华民族的精气神?

在经典中思考生活与爱情

冯俐



腊悲剧中歌队的形式,赋予其独立而直观的戏剧功能,以第三方群体视角与主角对话、外化人物内心活动,在烘托戏剧氛围的同时,增进场面的厚度和丰富性,拓宽叙事广度,深化主题表达。

从小说到歌剧的再创造,体现了作曲家施光南和编剧王泉、韩伟对鲁迅作品的深刻理解。他们娴熟把握正歌剧的创作规律,以令人钦佩的才华,构建了歌剧表达的叙事,将文学描写提炼为充满诗意、动人心魄的唱段唱词,以歌唱的方式诠释主题,呼唤新的时代为年轻人带来新的希望。

此次复排这部经典作品,是因为歌剧

同一个故事，如何出新出彩

——从电影《得闲谨制》到网络故事片《莫得闲》

孔笙

篇幅不同,也带来了不同的叙事方式。《莫得闲》在原有故事基础上,让情节更充分地展开,让观众跟着这群人走得更远一些,也在他们的世界里多停留一会儿。

故事是从一条江开始的。战争来了,人们沿着长江不断向西,辗转流离。有人逃难,有人撤退,身份不同,想的却差不多:先活下来,再找一个安稳的地方。莫得闲原本只是一个会修机器工人,有家人,有手艺,却被战争裹挟其中,再也过不上原来的日子。

若说长江承载的是这群人的流离,戈止镇承载的则是他们来之不易的安宁。宜昌沦陷以后,莫得闲一家和一群难民来到这个小镇,偏安一隅。战争的间隙里,儿子等闲在院子里玩耍,妻子夏橙唱着歌做着饭,老太爷种菜也念诗。老百姓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有一处可以安身的地方,就会扎下根来,把一个临时落脚的地方慢慢过成一个家。

可战争还是找到了这里。3个日本侦察兵意外闯入,打破了戈止镇的平静。这群原本只想躲开战火,踏实过日子的人,不得不再次面对一个问题:这一次,还能不能继续逃?《莫得闲》给了我们更多空间去呈现。从第一集沿江

景焕:民族元素不只是“佐料”。加段单一的民歌旋律或民族乐器的简单亮相,这样体现“民族性”似乎浅了些,还是要弄清楚旋律背后的情绪和逻辑,把民族音乐的气韵吃透。

用交响乐讲中国故事,最好的状态是:听众坐下来,不需要懂曲式、看解说,闭上眼睛,意境就涌上了心头。说到底,工具是共用的,心才是自己的。把心安踏实了,把“母语”琢磨透了,声音自然就是中国的。

李心草:用交响乐讲中国故事,要规避两个极端。一是全盘西化,单纯套用西方作曲模板,丢失本土情感;二是刻意本土化,生硬嫁接民乐音色,破坏交响作品整体结构。交响乐民族化,是精神气质、审美内核、情感表达的深度本土化。

陈燮阳:不止于此,作品还应该饱含我们中国人的情感和故事,有真切的本土表达,兼顾艺术高度与通俗美感,不能艰深晦涩。

记者:如何进一步提升中国交响乐的国际影响力?

陈燮阳:用作品说话,打造真正具备中国精神的原创作品,形成独一无二的艺术标识。

李心草:《春节序曲》里的家国温情、《百鸟朝凤》里的天人合一、《金蛇狂舞》里的昂扬活力、《西北组曲》里的黄土风骨……这些精神正通过音乐不断传递出去。未来可以打造更多兼具民族特色与国际审美、适配不同舞台形式的作品。

我们不仅要让世界听见中国音乐,更要让世界听懂中国音乐——听懂它背后的文化逻辑,听懂它承载的民族精神,听懂一个开放自信的中国所具有的胸襟。

在经典中思考生活与爱情

冯俐

文本所继承的文学内核,足以直击不同时代青年的精神成长命题。无论是小说创作时的五四运动后,还是歌剧首演时,及至当下、未来,刚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如何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安身立命的结合点?如何理解“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当你勇敢地选择了“我是我自己的”,之后还能不能不断充实自己,担当得起“我是我自己的”这句话?如何面对生活和爱情,依然是终身的课题。好的文艺作品,一定会给人们带来更深入的思索。

《伤逝》一直被艺术院校和剧院排演,多个重要唱段被无数学歌剧的学生和专业歌剧演员演唱,成为培养歌剧人才的代表性中国作品。这次中国歌剧院舞剧院同时推出三组扮演消生和子君的青年艺术家。

从排演到首演,观众的反馈让我们充满信心:人们从中感受到鲁迅先生原著中直面现实、揭示人性的丰富和冷峻,也感受到歌剧的结构匠心和扑面而来的跨越时代的人文气息。希望更多人尤其是今天的年轻人,能够借由这部经典作品,触摸45年前的歌剧、品味鲁迅先生1925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在艺术中彼此遇见,在经典中思考生活与爱情。

(作者为中国歌剧院舞剧院院长)

第三十八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即将在北京举办。这是时隔64年,“百花奖”重回初绽地。

大众电影百花奖,自诞生之初,便确立了“文艺为人民”的底色。尽管投票的形式随时代发展而变化,由广大观众做选择的机制却从未改变。1961年,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这个奖项的诞生拥有了“文艺由群众检验、作品由人民评判”的思想基础。1962年,首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颁发。从那时起,“百花”就不仅是一座奖杯,更代表着一种方向——电影人与观众在一起,艺术创造与人民生活在一起。

六十余载“百花”绽放,铭刻新中国电影百花齐放、繁花似锦的奋进征程。审视当下,如何拍出好作品、讲好中国故事,如何让电影真正服务于观众、服务于人民,是电影人必须直面和解答的命题。

我早年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做编辑、场记,后来到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进修。从一开始我就笃定,电影这种艺术表现形式,就是要用来展现鲜活、生动、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在西影厂拍摄《黑炮事件》《错位》,我们尝试以新的镜头语言、叙事方式、审美表达去捕捉社会转型期人们内心的激荡与期盼,揭示现实中的矛盾与困境。这些大胆探索,建立在对真实生活的观察与体悟、对人民情感的感知与把握、对时代变革的记录与思考的基础上。

后来,我们创作了《背靠背,脸对脸》《站直啰,别趴下》等影片。从《背靠背,脸对脸》里基层单位的人情世故,到《站直啰,别趴下》中邻里空间的微缩生态,都因为真诚有力的表达,触碰到日常生活中真实细腻又错综复杂的肌理,激发出有益的公共讨论。说到底,电影不能离开生活。

伴随中国电影在新世纪迈入产业化发展期,我在导演工作之外,相继负责编辑、制片、监制等工作,参与创作了多部重大题材影片,如《建国大业》《智取威虎山》《我和我的祖国》《长津湖》等。这些作品相继得到“百花奖”的认可,让我听到观众对电影的期待。

“十五五”开局之年,第三十八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回到北京举办,我觉得很有意义。百余年来,中国电影从北京获得过最初的光影想象,也在这里汇聚人才、连接观众,进而面向更辽阔的时代生活。从北京的文化脉络和时代方位出发,把北京早期电影放映、丰泰照相馆与《定军山》的历史叙事,新中国电影管理机构、电影团体、制片厂和电影教育的建设,改革开放以来京味电影、电影节展、市场机构和产业形态的变化,以及新时代北京出品、北京政策、“中国影都”等产业空间的发展,放在一条脉络中来观察,我感慨万千:北京的电影史是中国电影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赓续着“百花奖”的优良传统,创造着中国电影的新时代篇章。从这里发源的人民电影初心,终将在生活沃土上再创新篇。

我们更应该看见光影背后的人——看到热爱电影的观众,看到执着探索的创作者,看到投下大众电影百花奖选票的普通人,看到今天仍在奔走、拍摄、剪辑、等待观众评价的年轻电影人,更应该通过光影观照那些现实生活中的身影。电影最终要回到人,回到人的情感、记忆和选择。大众电影百花奖之所以有生命力,也正在于此。

电影服务人民,要求创作者走进现场,走进车间、田间地头、社区街巷去感受时代的脉搏,去捕捉生活的微妙。用电影讲好中国故事,关键在于讲出中国人的精神气质与生活温度,让观众在光影中看到自己、理解他人、获得力量。

今天,受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期待发生结构性变化。主动拥抱新大众文艺浪潮,接受新技术带来的创作方式的挑战,用我们的不懈努力,让中国电影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彩,是电影人的使命。

(作者为北京电影家协会主席)



戈止镇的百姓,一同热血沸腾,奋起反抗。

《莫得闲》是“剧好看”大屏点播专区的首发作品。我理解,人物立得住,故事让人相信,一集结束,观众还会惦记他们接下来会怎样,这就是最朴素的“好看”。

这些年,我们在做剧集的同时,尝试电影和网络故事片。形式不是目的,重要的是找到合适的讲法。有的故事适合在两个小时里讲完,有的则需要更多时间慢慢展开。不同的形式让我们不断学习怎样讲故事。

从《得闲谨制》到《莫得闲》,我们换了一种方式,再次走进这些人的世界。篇幅和节奏有所不同,但想讲的始终是那条江、那个镇,还有生活在其中的一群人。

(作者为导演)